

访谈

周永康
黎恩灏

黎恩灏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律哲学博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法学院访问研究员，著有《破解香港的威权法治：伞后与反送中以来的民主运动》等

周永康系香港“雨伞运动”主要学生领袖之一，并因此被香港当局判处入狱。现为香港民主理事会（HKDC）理事、海外港人杂志《如水》共同创办人及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地理系博士生

香港民主化 运动的过去、 当下与未来



周永康



黎恩灏

编按：争取香港民主化的运动在1997年前已经兴起。主权移交中国后，民主运动依然蓬勃，尤其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成为全球焦点。2020年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家安全法，大批民主运动参与者被抓捕或流亡，不少公民组织和媒体亦在政治压力下纷纷解体。如何看待香港近年的民主运动？在中共强力管治下，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何去何从？就此，受《中国民主季刊》之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访问研究员黎恩灏博士和知名香港民主运动组织者、前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进行了对话。

黎恩灏（以下简称黎）：华人读者大多认识你，因为你是近年香港民主运动中年轻一代的组织者之一。请向读者介绍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

周永康（以下简称周）：我2011年进香港大学念本科后，本来是想当一个“文艺青年”：专注文字创作、加入一些青年文学协会等。之后参加香港大学学生会的文字媒体《学苑》的聚会，讨论中惊觉中共透过卫星组织渗透

不少大学学生团体，尤其学生会，这些团体长久以来是支持民主化的力量和中共渗透力量双方角力之地。当亲历其境，我就想要遏止学生组织继续被“赤化”。所以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学生会选举，当选了学生会的外务副会长，同时兼任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亦因此，我经常到学联开会，透过学联逐步接触到不少社会事务，比如2013年香港的码头工人罢工。

当戴耀廷在2013年提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以争取香港普选行政长官（特首）的计划后，我们学生组织也去跟戴开会讨论占领中环的筹备工作、在公民社会举办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商讨日活动等等。大学校园也是举办商讨日的地点之一，所以大学生和学生组织自然也是参与者。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讨论如何让大学生能成为这次民主运动的先锋。我们在2013到2014年举办学界的商讨日、学界公投政改方案、和平占中民间投票、在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后发起“预演占中”等。当时我已成为学联的秘书长。既然自己早已参与，也就决定继续完成它，在学界的岗位投入这些政治工作。2014年暑假，北京公布“8.31决定”，规定未来的特首选举提名人需要由中共控制的提名委员会把关，等于否决香港真普选。我们就在学界组织罢课，后来我和其他学联成员占领“公民广场”（香港政府总部前），直到雨伞运动的爆发，民众占领了香港三个主要商业区，抗议持续79天才结束。在整个过程中，我和香港社会一起参与到民主运动里。

在雨伞运动结束后，尽管当时争取不了真普选，很多同路人觉得大家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在思考用什么策略可以促进民主化进程。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深耕细作”，即回到社区、建设社区群体，我们俗称作“伞落社区”。的确，雨伞运动后，新生的支持民主的专业团体、社区团体如雨后春

策，大家都希望参与占领运动的民众能一同在社区、在日常建设民主活动，促进民众的政治觉醒，提升社区的政治意识，使民主运动更有深度和层次。同时，2015年香港举行区议会选举（全港十八区），亦促使我思考自己之后会不会参与立法会选举，因为这可以将雨伞运动累积的网络和政治能量投入议会选举，继而扩大民主派的社会力量。虽然自己最终没有参选，但在此过程中和各界民主人士组织讨论，最终催生了一个新政党——香港众志。它主要由前学民思潮和前学联成员组成，同时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政治素人”加入并参选，成为民主派在立法会的新兴力量。

我也在不断思考民主运动中的什么位置最适合自己的。对我来讲，参与民主运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希望它能对香港社会有所改变。那自己到底用什么方式去促进这个改变呢？这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采取不同的方法，和同侪一起思考和探索下一步，继而前行。总而言之，就是要找到自己可以实践又能带动改变的方案，甚至透过灵性修持也会实现改变，毕竟我一直思考：社会改变的核心是人心的改变，还是物质条件的改变？抑或是政策的改变呢？我一直没有答案。所以我想，如果有一些空间在学术上和灵性上进修的话，那就可以继续探索参与民主运动的方式和位置，这亦是我负笈美国和坚持参与民主运动的原因。

黎：回首2014年香港的雨伞运动，你作为主要组织者之一（学联秘书长），当时如何看香港的民主化、中国和香港的关系，以及传统民主运动和新生代的同异之处？

周：当时对民主化的理解，其实比较笼统。一方面希望有一人一票的直选，

香港人也可以拥有平等的提名权，所以当时有个倡议是“公民提名必不可少”。但对于传统民主派来说，他们觉得提名参选特首的要求，如果可以降低到只需提名委员会八分之一成员提名即可参选（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即150人提名就可达标），那么民主派就有能力派人参选。当时我和部分学联成员的意见是，要争取真普选，就要同时废除立法会的“功能组别”制度，才可以消除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在整个选举制度里的庞大影响力（当时香港立法会，70个议席当中有30议席由来自工商界和专业界别的功能团体产生，它们的选民基数远低于直选选民数目，但往往能发挥否决权，令多数选民支持的议员议案不获通过）。所以，香港的民主运动，应该在争取一人一票的政治直选之余，也要争取香港的社会经济政策趋向一个更公平和更平等的方向，令香港变成一个更公平正义的社会。

这种民主化图景和对中港关系的想像其实是含糊的。这种民主化想像当然包括对香港能继续维系“一国两制”，或者是“港人治港”的期望，因为香港民主运动的核心议题也是希望香港的政治制度可以有直接民主选举，继而有民主问责的机制。但这个想像会否提升到要改变香港同中国的宪政安排呢？当时（2014年）没有这方面的讨论。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未必有能力处理中国问题。香港发生的事情，才是香港民主运动的核心。如果改变香港，有朝一日可能也会逐渐改变中国，或许中国将来会有剧变，但这些并非当时学生组织者可以想像和讨论的事情。

让我举一个例子。雨伞运动期间，我们学联在讨论要不要到北京请愿。当时就发觉，自己从来不认为北京的官员能代表自己，只是他们在政治制度上有权力影响香港而已。因此，如果纯粹谈个人感受的话，我当时感到中国和香港的关系很薄弱，亦因如此，我感觉没有办法可以对中港关系有具体

的倡议。

这也可能是传统民主运动和新生代之间一个比较根本和主要的分别。尽管大家都希望香港能够民主化，但对于香港民主化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宪制安排应该怎样，其实仍在探索，未有确切答案。不少传统民主派成员会认同一国两制的框架：香港无可避免是中国的宪制领土之一。他们多少抱有一种中国想像，期望中国会有民主宪政、香港会成为这共同体的一部分，共享中国的国家图腾；“中国人”亦是大家会自豪地拥抱的身份认同。但对新生代来讲，虽然“香港是中国一部分”是既成事实，但不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状态，应保留一种开放性。话虽如此，但新生代不一定有一个确切或既定的答案，中港关系仍然是有待讨论和想像。

黎：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前夕，你和示威者闯入俗称“公民广场”的政府总部静坐抗议，后来被香港政府以“参与非法集结罪”起诉，继而在2016年被判缓刑。但政府的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上诉，令法庭改判你监禁7个月，被视为香港“新一代”政治犯之一。尽管你最终在终审法院上诉胜诉，但你实际上也坐牢了数月。你这个成为阶下囚的政治犯经历，对你回顾和继续参与香港民主运动有何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周：对我来说，成为政治犯的消极影响，就是政权不只逼迫或打压你，身边人也会受影响，比如朋友、家人、亲戚、伴侣，他们的确因我入狱而受到直接的冲击，令我和我身边的人一块受惩罚。在这被惩罚的过程，我会有一种挣扎，感到对身边人有所亏欠，十分内疚。我在囚期间，有一次母亲来探访，她一见到我，还未坐下就哭了。那时我真的感到很内疚，好像自己做错事要母亲承受，真是一种切肤之痛。2017年后有更多的抗争者入狱，无可

置疑是对民主运动和抗争群体的挑战。大家都会思考，到底我们要不要被捕、坐牢？坐牢的话，如何捱过牢狱之苦，在逆境生存。牢狱外的人又如何面对身边人身陷囹圄？在保护自己的心智和精神健康之余，如何继续支援在囚人士？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至于成为政治犯对参与民主运动的积极影响，就和我看民主运动的视野和愿景有关。我在监狱一段日子，遇到很多平日不常接触到的社会阶层——事实上大部分囚友不论年纪，都在社会低下层和社会边缘，教育程度不太高。他们各自面对不同的定罪和问题，比如贩毒、打劫、伪造文书等。而他们之所以犯事，不少是因为经济状况陷入绝境。接触到这群囚友，我会对香港社会有更深体会：为什么香港社会发达如此，还有这些要在社会边缘打滚求生的百姓？为什么社会如此富裕，却无法好好照顾这些人？即使人人努力，也不一定人人会得到生活保障。很多人被迫铤而走险，继而被捕判监，这正反映香港经济对低下阶层和弱势群体，没有提供可以自给自足的出路和资源。从体制的角度看，香港社会强调经济发展、繁荣至上，人人可以分一杯羹，但事实上这社会非常排斥弱势群体。这些在囚经历，驱使我思考如何令香港出现改革，令社会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可以得到照顾。这亦促使我之后思考香港民主运动时，将经济问题、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扣连其中。如果民主运动或民主化的影响范围更广泛的话，没有理由不思考如何让社会大众和弱势社群之间的夹缝，以及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夹缝接驳更好。

黎：2019年大批群众反对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它让港府可应大陆当局要求移交逃犯的安排。这场运动历时超过半年，运动诉求亦扩大到追究警察暴力和全民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等等。运动期间你身在美国攻读博

士，你如何看这场运动？它对香港民主运动有什么影响？

周：事后来看，我觉得反修例运动是香港人“尽地一煲”（孤注一掷、没有退路的意思）的一次反抗。在雨伞运动后、反修例运动前，香港再没有发生过大型社会运动。期间新当选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当局取消议员资格，香港民主运动在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空间。到反修例运动爆发，成为不少香港人动员身边人参与抗争的契机。那次动员过程，相信是大家希望透过社会危机，令社会大众可以重新凝聚，看看如何一齐逆转政府修改逃犯条例的决定，同时逆转政府横蛮无理的管治。这亦是反修例运动的背景。其中的脉络，就是如何开展运用更多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策略，包括占领立法会、各个社区的“连侬墙”（展示抗争宣传海报和诉求的实体平台）、社区集会示威，以及讨论运动应否策略上升级、抗争活动的去与留等等。当这些社会动员能瘫痪政府施政或社会运作，就有足够力量可以施压整个管治阶层。这亦是反修例运动的其中一个特征：透过集腋成裘，在谷底逆转，带来真正的改变。

这场反修例运动，其实是不断革新自己的运动：群众不断思考抗争的新形式和新策略，除了大规模冲突，亦将同年举行的区议会选举视为运动的一部分，促使支持民主的反对派大获全胜，反映大众希望这场运动带来一种民主进程。的确，反修例运动迎来北京的反扑，它后来在香港实施国安法，震慑整个香港公民社会，不少团体要自我解散、流亡，以防被政权缉捕、检控。这对香港民主运动是巨大打击。

黎：坊间曾经出现一种观点，指反修例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它“失败”的原因，是为因为抗争者没有在运动过程中及时妥协，所谓“见好就

收”。比如，有论者认为2019年7月1日抗争者闯入香港立法会大楼后，运动手段变得更加激进，甚至出现暴力元素，和运动初期的百万人和平大游行迥然不同。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周：这种批评的前提是对大型和平抗争、和平示威的错误想象。实际上，你又如何可以控制参与运动的群众呢？不少抗争青年希望运动不止于和平大游行，加上运动初期有年青抗争者不幸坠楼及自杀，这些事件激起很大民愤，在此情况，根本没有单一团体或个别人士可以控制或者阻止抗争和整个运动的走向。提出批评的人可能有良好意愿，希望运动过程有一个理性调节。但群众运动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参与其中，运动内部充满大量张力甚至冲突，大家充其量只能做到适度调节而已。举例来说，当时运动出现所谓“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勇武抗争”的策略，群众都尽力尝试和推广“和勇不分”、两套抗争策略共存，不互相批评，令整场运动相对而言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但要做到“见好就收”、即时“悬崖勒马”，这似乎是行军打仗的想像吧，和群众运动、社会运动是两回事。

黎：的确，用行军打仗的框架去批评社会运动，可以说是张冠李戴，更忽略了每一位运动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亦将反修例运动错误理解成一种有高度纪律性、犹如先锋党组织领导的政治斗争。这亦引伸到另一种针对反修例运动“没有大台（没有特定领袖和组织）”和“去中心化”的批评，这些批评部分也来自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观察。这些批评认为，正因为反修例运动缺乏一个动员和组织的中枢（大台），令整个运动的走向犹如脱缰野马，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另一方面，2022年末中国大陆的白纸运动，亦被视为去中心化运动的一个显例。你认为，组织群众参与民主运动，到底是“去中心化”还是“中心化”的动员模式更可取呢？

周：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真的要从具体处境出发，要看该社会肌理，可以产生什么样的运动组织形态。以香港来讲的话，群众未必是主动采取去中心化的动员方法，而是香港社会变迁过程的一部分，例如社会成员之间有没有足够互信、民众对公民团体、反对派政党的信任度不够，都影响到动员模式。在香港的处境，去中心化的运动形态和组织形式其实比较切合现况，能动员到民众投入参与，亦令群众运动海纳百川，不同派系可以合而不同地朝同一个方向进发。

如果将反修例运动和2014年的雨伞运动比较，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当时也有将民主运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者并驾齐驱的想法。譬如他举办政制改革商讨日，就是希望将决定权下放到社区层面。他在雨伞运动后也有反思，就是“和平占中”运动一开始时，是否应该把所有的政治议程都交由大家参与讨论，让大家一齐决定运动的终极目标、愿景、方向、策略等等。他认为这样或许可以避免之后的内部矛盾和分歧。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一开始什么都依赖商讨日作决定的话，不少人就会对运动的目标和纲领感到模糊而最终不参加，从而影响运动的动员力。所以，去中心化或者中心化的运动模式，到底哪个会产生更大的空间、凝聚更大的共识从而更有持续性，真要靠运动组织者和抗争者去摸索社会肌理，继而逐次判断、实验、尝试，摸着石头过河，找到最适合那一社会的抗争方式。

黎：在你看来，香港如何影响了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共产党在2020年要通过港版国安法，从根本上改变香港自由民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周：我想可能其中一个关键是反修例运动期间的区议会选举结果。当大家见到一个直选的地区性选举，香港民主派得到几乎九成的议席时，这个对

中共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和警号。中共自然会想，2020年有立法会选举的话，他们控制的亲中阵营是否会同样惨败呢？虽然香港的选举制度设计上有利于北京，但民主派成功协调的话，真的可能打破垄断，为中共带来威胁。当民主派得到接近甚至超过半数的立法会议席，就可以拖延议会进程，乃至否决香港政府的财政预算，令香港政府无法继续运作或管治。对北京来讲，香港就好像处于一个完全失控的局面，因为民主派已经可以反过来利用中共设计的政治制度。这也许是一个关键的在地（香港内部）因素，让北京决定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以及后来大规模抓捕、打压反对派势力。诚然，外部因素也包括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中共管治模式，以及2008年金融海啸后，中共对于自己的国际地位或者经济实力的评估。香港在1970至1990年代被视为帮中共“生金蛋”的城市，但中共现在还有多大程度需要香港作为输入外国资本的一个中转站呢？中共当下似乎有一个新的观点与角度，重新看待北京与香港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共管治香港，是否继续维系1980年代所谓“一国两制”的妥协与承诺就好，还是将国内的管治方式，即全面镇压和全面监控的管治方式，移植到香港呢？我相信，中共将国安法加诸香港身上，就是为了防止自己处于一个被动形势。所以它在2020年立法会选举之前，就决定腰斩选举，主动出击扭转形势。

黎：在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越来越多香港人移居加拿大、英国、澳洲以至美国等自由民主国家，建立香港人社群，逐渐形成香港人的离散行动主义（diasporic activism）或海外抗争（俗称“国际线”）。你一直身处美国，在当地继续有关香港人的倡议工作，你对延续海外香港人社群和海外抗争有什么观察和愿景？

周：现在海外香港人的处境，也是在摸索有什么事情可以发挥、实践。大家

也明白这些工作不一定能得到实际效果，也不知道对未来的民主运动和抗争有什么帮助，但有空间的话就都会尝试一下。我相信大家内心都会有一个愿景，比方当未来出现巨大的局势变化，自己目前的工作可以作出贡献。有些朋友比较关注倘若台海战争发生的话，自己可以从知识或技能上发挥应对作用。有些海外社群在思考，当香港本土失去了文化自由，如何在海外将香港文化落地生根、保存香港人身份认同、象征和价值观等等。要实现这些理念，必须要在海外开拓一个香港人社群可以生存的空间，包括要有语言学校、文化保育、推广香港电影、音乐、饮食文化等。例如今年三月英国的香港文化节(Hong Kong March)，这会促进当地人了解香港离散群体和香港文化。又譬如美国和加拿大开始出现一些社区中心，希望这些实体空间可以凝聚海外港人。海外香港社群也有部分人从事政治性强的倡议及游说工作，建立香港人和移居地的执政当局的友好关系，从而影响后者的对华政策及对港政策，包括接收香港难民等等。这些工作，可以令不同的西方民主国家重新思考中国的贸易政策、科技政策及人权政策，某种程度上可以克制或防止中共在国际层面的扩张。这些都是些海外社群尝试做的事情。我感觉在海外的香港人群体，其实都是希望：当有冲突、灾难或者剧变发生时，海外香港人会有足够的能量、网络、专业、技术，提供各式各样的支援。

最终，如果中共出现剧变，香港要提出怎样的政治议程呢？中央和地方（香港）的行政架构、权力安排又如何定夺？香港的财政制度应如何设计，香港应否有一个中央银行，又能否继续享有自己的货币？香港会否和华南地域融合，被划分成一个新势力？如果香港要自决或独立，周边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又会否承认？海外香港人就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思考和想像，甚至具体的制度安排。我想这也是我自己期望做到的事。毕竟，尽管香港未

来有一种可以政治自决的可能，但也会面对很多挑战，尤其是中国大陆仍然有很多国族主义者，期望香港成为中国宪政架构的一部分。当香港人要求自决，或者要求一套新的宪政安排时，也需要衡量和评估不同的宪政安排——美国联邦制也好，类似欧盟的体制也好——对香港的自主自治有什么正反的影响。香港人可能要对不同制度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才可以比较分析何种方案最适合香港的社群自治。无论如何选择，都要有付出代价的准备。我自己也在思考，学习、研究不同的议题，看看其他国家的经验，希望带动到一些思考方向。

黎：可以预期，在未来数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以至在地缘政治上，全球都会出现急剧变化，在这不确定的政治情势下，香港民主运动何去何从？你认为香港的民主运动，策略上还有空间和中國大陸以至其他族群的政治运动连结吗？

周：对于联系其他在中国边境受迫害的族群，以至台湾的社群，我觉得绝对有策略价值和意义。但是也要面对一个挑战：大家的政治议程或利益有时可能未必是完全一致。它有一致的地方，也会有张力的地方。一致的地方可能是大家期望中共倒台或者剧变。但这倒台或剧变的过程，大家对如何达到自决，想法可能很不同。这些歧异也可能牵涉日后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安排。不知道在这个跨种族的反共阵营里，有多少人有兴趣思考和想像这个课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中国边陲社群和香港人比较相近的地方，可能是大家希望有一个领土自主，继而有自决的可能。但这方向又可能和中國大陸的一些民运人士如何去理解一个新的中国宪政安排有张力，甚至冲突。无论是在大陆或是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究竟他们想像的民主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怎样的呢？多少人还有顽固的

大一统思想情结？

我自己的感觉是，中国幅员广阔，要做一个政治转型的话，牵涉的问题非常大。如果中国民主运动未有足够的想象，周边的群体要代替它思考的话，要有更多考量。以欧洲或欧盟经验为例，二次大战后欧洲重建和转型都牵涉不同的欧洲国家参与。如果对比中国，如果有一天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国家的话，当大家要重建经济时，最终是否又要回去建立一个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在中国这幅员广阔的地方，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都各自处于不同的经济状况时，不同民族的政治自决带来的种种政治经济安排，全是大课题。此外，台湾朋友的利益考量跟我们也可能不同。他们也许不介意美国继续当维系世界秩序的龙头，台湾也可以继续镶嵌在美国为首的全球制度里，保持台湾的经济角色，受美国保护。它亦可能不需要处理太多和中国地区的未来宪制安排，这和香港或图博（藏区）、维吾尔的处境有或多或少的分别。

究竟这种跨族群的反共政治联盟可以维持多久呢？香港人群体如果和其他政治群体建立和维系联盟，这联盟的基础是什么呢？有什么事要妥协呢？当然，这毕竟可能是民主运动的极限：即如果我们真的实现民主化，就不能避免要建立一个新的政体，或者变成不同的民族国家。到时候，一些现代国家政体面对的局限就会出现。例如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问题可能相对比较远，但我们现在就必须去深入研究和思考。